民本、有机与演化：严复“群学”思想探究

马学军

内容提要：严复的“群学”概念，为翻译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而来，其既是一种研究“群理”的实证科学，也是一种变法自强的方式。本文立足于严复的著述，从作为“学问之要归”的“群学”、以“民本论”为基础的“群学”、具有有机论和演化意义的“群学”四个方面来阐释严复的“群学”思想。严复的“群学”思想，在学科知识、自然秩序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了一套总体性的解释思路，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也影响了民国社会学家的思想。深入探究严复的“群学”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变以及中国社会学的诞生。

关键词：严复；群学；民本论；有机论；进化论

一、引　言

时至今日，我们都会视严复先生为中国社会学诞生的先驱人物，认为其所使用的“群学”概念很好地抓住了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精髓（阎明，2004：3）。然而，我们一般又认为严复并非职业社会学家，也没有为社会学奠定科学的基础，似乎除了留下早已被淘汰的“群学”一词外，就没有给中国社会学贡献其他什么东西（应星等，2006：188-189）。可是，在晚清社会激烈变革之际，严复引进社会进化论、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翻译并阐发社会学专著《群学肄言》，可谓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人（杨雅彬，1987：25）。

更重要的是，严复是中国近代系统引入西方学术思想的第一人，给国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影响广泛而长远（李泽厚，2008：262）。严复在晚清思想中的特殊地位就在于，“他以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方法为背景建立了一

作者简介：马学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本文得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才培育发展计划”支持。感谢匿审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个完整的新宇宙观,并在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持下,提出了一套变革的方案,从而有力地回应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和时代的挑战。”(汪晖,2019:833)通过译介并阐发西方学术思想,严复在社会生活、知识领域和自然秩序之间建立了一种总体性的关联,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提供了完整的现代性方案,这种总体性思想就体现在严复的“群”和“群学”概念之中(汪晖,2019:882-884)。

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和《原强修订稿》文中,严复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阐述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首次提出了“群学”概念。严复认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严复,1895c/1986:16)。严复还将斯宾塞的学说,与《大学》诚正修齐治平之说相比附,认为二者有不期而合者(严复,1895b/1986:6)。严复认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严复,1895b/1986:7)。以此来看,严复的“群学”概念并非一个被淘汰的名词,实蕴含丰富的总体思想,其既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思想观念和现实变革的方案,对我们理解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变和中国社会学的诞生非常重要。

然而,长期以来,严复的思想更多是在近代思想史的领域中得到研究(如李泽厚、史华兹、黄克武等人的研究),而在社会学的学科领域中却少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倡导梳理并挖掘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和遗产(应星等,2006),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仍偏重梳理1920年后制度化、学科化的中国社会学传统,而对1920年前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发掘不够(应星,2018)。严复应“世变之亟”,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提出“群学”,为中国现代变迁给出了“社会”逻辑的至高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渠敬东,2015)。

其实,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他们对严复的思想是非常重视的。被称为国内第一位留学归国的社会学家,还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陶孟和,归国后在1913年所著《平等篇》中,引用严复“群力”“群治”的观点,来讨论现代平等、自由和民主问题(陶孟和,1913);潘光旦在《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潘光旦,1924)、《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潘光旦,1939)等文中,直接论及严复的天演学说;林耀华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十万多字题为《严复研究》(1932)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文修改后以《严复社会思想研究》为题发表在《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林耀华,1933)。

近九旬的林耀华先生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研究经历时,还特别阐明了研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究严复思想的初衷:“我认识到在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方面,严复曾有特别的功劳。是他系统翻译介绍了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社会学思想;是他对近代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他在译著中将传入之初的社会学译为‘群学’或‘人群学’,并将其列于‘经世之学’之列。严复不仅是启蒙思想家,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先驱者。研究他的社会思想与学术成就,可以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以及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历史。”(林耀华,1999:9)

诚如林耀华先生所言,严复不仅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特别的功劳,而且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严复的这种思想启蒙,不仅影响了早年的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史华兹,2010:2),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陶孟和、潘光旦、林耀华等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这些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他们既有旧学背景,还受过很好的西方学科训练;他们出生于清末民初,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不能仅从社会学分支学科的角度理解,也不能仅限于所受国外思想方法的影响,还需放在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大变动中来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严复“群学”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学的诞生,更有助于我们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理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的学术思想。已有一些文献也讨论了严复的“群学”概念,但缺乏从严复著作内在的理路来理解。本文立足于严复的著作文本,从作为“学问之要归”的“群学”、以“民本论”为基础的“群学”、具有有机论和演化意义的“群学”四个方面来阐发严复的“群学”思想,以期理解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以及中国社会学的诞生。

二、作为“学问之要归”的“群学”

何为“群学”?严复在《群学肄言》序言中解释说:

> “群学者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严复,1903/1986:122)

“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首先说明“群学”是一门运用科学的方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法,来研究群理变化,明既往测方来的学问。严复认为,西方技术、器物、制度的强盛,根源在于学术的发展,没有一事不探究学理。严复在《救亡决论》文中指出,“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王轼,1895d/1986:48);相反,中国落后,根源在于学术落后,家、国、天下之事,事事不明因果之理,传统八股制度是阻碍中国学术进步的最大障碍(王轼,1895d/1986:43)。在严复的语境中,“科学”有时指自然科学知识,有时还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他常将“科学”与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概念相比附;严复赞赏西方自然科学的价值,但更注重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改造中国文化、风俗以及精神信仰层面的价值(韩立坤,2014:275-277)。

“群学”的宗旨是“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但其基础是以科学的方法,将各种学问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连续性的知识谱系。在《原强》文中,严复称赞斯宾塞的学说言,“至锡彭塞之书,则精深微妙,繁富奥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于一国盛衰强弱之故,民德醇漓翕散之由,尤为三致意焉”(严复,1895b/1986:6)。这表明严复十分重视斯宾塞学说中的科学精神,一人一事、一理一论都必寻根问底、追求实证。这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群学”,最终的旨趣在于将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合一,以明治乱盛衰之由,发挥修齐治平和变法改革的功用。

严复指出,治“群学”如果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群学”之理就会不明,进而会误国误民。严复解释说,“何则?格物之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严复,1895b/1986:6)。格物之学不学,研究者的思维、观念以及习惯有偏狭之处,就很难明“群学”之理。如何才能掌握“群学”之理?对这一问题,严复在1895年3月《原强》文中首次作了详细的阐释。严复认为,“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严复,1895b/1986:6),这些“诸学”包括:数学、名学(逻辑学);力学、质学;天、地、人三学;人学中的生物学、心理学。为什么治“群学”,先要了解这些学问呢?严复指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严复,1895b/1986:6)。这就是说,先学数学、名学(逻辑学),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自然规则和事物演化的必然性,学物理学(力学)和化学(质学),可以帮助研究者知道事物之间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密切的因果关系。

仅仅学这四门学科，还是不够的。严复进而指出，“名数力炙（质）四者已治矣，然其心之用，犹审于寡而萤于纷，察于近而迷于远也，故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严复，1895b/1986：6）。严复在《原强修订稿》文中解释道：“盖于名数知万物之成法，于力质得化机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学，各合而观之，而后有以见物化之成迹。名数虚，于天地征其实；力质分，于天地会其全，夫而后有以知成物之悠久，杂物之博大，与夫化物之蕃变也”（严复，1895c/1986：17）。这就是说，学了名数力炙（质）这四门学科，研究者的思维观念和习惯方式还不健全，仅可以把握浅近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对间接的、复杂的因果关系不能明了。名学、数学有些虚空，借助天地之学才能更实；物理学、化学又有些分散，借助天地之学才能更博大。这样才能更了解宇宙进化的连续型、复杂性和偶然性。

关于“群学”之前的“诸学”分类，严复在1898年9月《西学门径之功用》文中，又有了新的表述。严复认为，为学之道，第一步为玄学，第二步为玄著学，第三步为著学，而后终以群学，其中玄学包括数学、名学，玄著学包括力学、质学，著学包括天地人三学等。在学完玄学（数学、名学）、玄著学（力学、质学）之后，为什么还要学著学（天地人三学）呢？严复在文中说，“著学者用前数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以考专门之物者也。如天学，如地学，如人学，如动物之学。非天学无以真知宇之大，非地学无以真知宙之长。二学者精，其人心犹病卑狭鄙陋者，盖亦罕至矣！至于人学，其蕃变犹明，而于人事至近。夫如是，其于学庶几备矣”（严复，1898a/1986：94）。这就是说，天、地、人这三学，是用前面学科的公理和原则来研究具体领域的科学。学习了天文学、地质学，人的思维观念和习惯也就不至于偏狭鄙陋。而“人学”离人事最近，更要深入研究。

“玄学”“玄著学”“著学”对应的英文名称为“abstract science”“abstract-concrete science”“concrete science”（沈国威，2018：76）。学习“群学”，第一步需要学习名学、数学等抽象科学（abstract science），虽然不落实处，但能把握必然之数。这两门学科还是过于抽象，思维、智力和习惯仍然不能得到完美训练，还需要学习物理学、化学这样“抽象-具体”的科学（abstract-concrete science），就能知道事物之间因果关系。不过，这仅能明了直接、明显的因果关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系,而对间接的、复杂的因果关系还是不能把握,所以需要学习“具体的科学”(concrete science),运用上述公理、原则,来专门研究一个具体的领域,如天文学、地质学和关于人的学问。

而人学,在天地人的学问中尤为急切,是“群学入德之门”的学问。严复在《原强》文中进一步阐释道:“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何则? 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末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故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人学又析而分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盖一人之身,其形神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而一切政治之施,与其强弱盛衰之际,特皆如释民所谓循业发现者耳”(严复,1895b/1986:6-7)。这就是说,由人而集合的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其体用功能也如生物体一样,有其生物和心理属性,当需首先要了解。

“群学”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严复在《西学门径之功用》文中言,“群学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财,如史学,皆治事者所当有事者也。凡此云云,皆练心之事。至如农学、兵学、御舟、机器、医药、矿务,则专门之至溢者,随有遭遇而为之可耳”(严复,1898a/1986:95)。也就是说,严复认为政治学、法学、财政学、史学等,都是“群学之目”,治事者当有所掌握。至于农业、军事、医药等专业性学问,如有必要可以学习。严复在《西学门径之功用》文中最后言,“而人道始于一身,次于一家,终于一国……而人生有群,又必知所以保国善群之事,学而至此,殆庶几矣”(严复,1898a/1986:94-95)。对于治学者来说,人道从己身开始,然后是家庭,最后是国家,再知保国善群之事,学到这里一个人也就完整了。

这些学科所研究的道理,最后都以“群学”为要归。严复在《原强修订稿》更明确地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 此真大人之学矣!”(严复,1895c/1986:18)也是就说,研究“群理”变化的“群学”是大人之学,其他学问都以“群学”为要归。“诸学”所研究的现象在具体的社会变迁和人伦事理上都有所表现。一个人、一件事或一地的民风民俗,都蕴含无数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乃至心理、生物和天文、地质、力学、数学的知识。学习这些学科知识,是理解具体的个体和社会有机体构成和变化的基础,最终目的是理解人与人、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人与社会有机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治“群学”,既要治事,又要理解“人”,还要有诸多学科的准备,而研究者又处于所研究的人事之中,要做科学而广博的研究实为不易。在《群学肄言》“知难第四”篇中,严复言“盖科学莫不有其所治之事物,与能治其事物之人,而能所二者对待之情状,科而不同者也。自是三者于群学独异,而莫同于他科,此群学之所以难为,而其难亦为他科所未有,是固可得遞指其略者矣”(汪征鲁等,2014:52)。严复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也指出,“顾治斯学有甚难者,一曰在物之难,次曰在心之难,三曰心物对待之难”(汪征鲁等,2014:9)。因此,《群学肄言》第五篇《物蔽》分论“物之难”,第六篇《智絃》分论“理”之难、第七篇《情瞀》分说“情”之难。

可见,严复的“群学”是“学问之要归”的科学,其首先是以抽象的科学(数学、逻辑学)、抽象-具体的科学(物理学、化学)、具体的科学(天文学、地质学、人学等)为基础和前提的。这些学科所研究的现象在“群学”探究的社会变迁和人伦事理上都有所表现。研究“群学”,首先要有这三门学科的基础,以此才能具备一定的思维习惯。“群学”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玄学”“玄著学”的抽象性和形而上性,但并不像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去探究具体的自然现象,也不是农业、军事、医药等专业性学问,而是一门研究具体人事变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说,在严复的知识谱系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的不是一般的形而上学,也不是一般的技术之学,他真正关心的是与自然、天地、人伦有关联的社会组织和伦理关系。“群学”所探究的“群理”,也集中表现在社会变迁和人伦事理的形态和变化之中。

三、以“民本论”为基础的“群学”

“群学”不仅是一套知识系统,而且还是一门明兴衰治乱、修齐治平的学问。严复介绍斯宾塞的学说,现实的目的是通过探究西方强盛的缘由,来寻求中国富强的道路。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指出,“严复从斯宾塞那里得到的牢固信念是: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说是通过御驾文明的利己来加强的,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文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体、智、德的潜在能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史华兹,2010:40)。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受斯宾塞观点影响,严复认为中国处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中,若要自立图强、保种保国,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并进,才能治其本。民本的前提,是个体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必须植入现代的因素,在广大国民中培育具有自由、平等基础的人格,才能强本固民,群力才能强大。

严复指出,《群学肄言》书中《明民论》《劝学篇》二篇最为著名。“《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严复,1895c/1986:17)。严复在《原强修订稿》重点阐发了德、智、体作为民本要素的观点:“夫如是,则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严复,1895c/1986:18)。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中西文化的命脉不在天算格物的差别,而在于社会伦理和文化的差别,自由、平等的观念差异又是最根本的差异,“自由既异,于是群异纵然以生”(严复,1895a/1986:3)。在《原强》文中,严复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海禁既开,也仿造西法,设总督,建学堂、建铁路、矿务、外交、纺织、出使、电报等等,但仍然战败,不能自强。“是何以故?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严复,1895b/1986:15)。严复认为当时中国实为一“病夫”,民智不开、民德已衰、民力已困。若不固民本,仅凭一二人推行的变法也最终会失败。严复在《原强》指出“中国者,固病夫也。……今夫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有一二人焉,谓能旦暮为之,无是理也。何则?有一倡而无群和也。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合也,否则立槁而已”(严复,1895b/1986:13)。

严复认为,少数人推动的变法图强是治标不治本,民才是一国之根本,人心风俗的转变才是一国自强的根本之道。唯有从民力、民智、民德入手,培育国民之根本,才能本固邦宁,变法图强才能成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严复,1895c/1986: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27)。“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并进,才能治其本。

何谓“鼓民力”?严复在《原强修订稿》解释说,“然则鼓民力奈何?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甚,此自功名之士观之,似为甚迂而无当。顾此非不佞一人之私言也,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严复,1895c/1986:27)。身体健康、强健有力,为民力第一要务,是民本三要素之中最急切的。严复指出,西方人极为重视强身健体,而传统中国繁文缛节,贻害民力甚多,其中沿袭最深、危害最大的“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严复,1895c/1986:28)。鼓民力,首要是废除女子缠足、禁止吸食鸦片。

何谓“开民智”?严复在《原强修订稿》解释说,“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上,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严复,1895c/1986:29)。追求学问、探究事理,而非追求功名,此谓“民智”。“民智”是民本之原,是富强之原。在长期八股制度影响下,中国有大量追求功名的人士,而非追求学问的人士,以致“民智已下”。严复认为,“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严复,1895c/1986:31-32)。废除科举,兴办教育、实行地方自治、选举地方官员,设立议院于京师,都有助于“民智”的培养。

何谓“新民德”?严复在《原强修订稿》解释说,“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是故居今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儿御外仇,则非又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严复,1895c/1986:31-32)。“民德”贵在人心相通,为民本三要素之最难。在《群学肄言》《喻术》篇中,严复认为群之变与民德息息相关,“故群之变也,视民德之进退,群性与民性,群德与民德,相待为变,其例则群学之所有事也”(汪征鲁等,2014:40)。“群学”的根本在于以民本为基础,而“民德”贵在人心相通。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三 制私”按语说,“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益群者灭。盖群者何也?盖相感通者是?”(严复,1898b/1986:1347)这就是,在严复看来,人心是否相通相感,是一个群强盛的关键所在。

严复认为,每个国民都是国家的一分子,应当共同负起自强的责任(严复,1906/1986:166)。为实现自强,开启民智,严复不仅著书立说,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而且十分重视教育。严复认为,“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势而为之重轻。是故居今而言,不佞以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严复,1906/1986:167)。严复关于民智、民德、民力的思想,很大程度受斯宾塞《智育、德育和体育》文中的思想所影响(蔡乐苏,1999:296)。

需要指出的是,严复的“民本论”的基础是自由,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民主”思想。李泽厚就指出,严复的思想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自由”才是“体”,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李泽厚,2008:285-287)。在《原强修订稿》中,严复指出一国之强盛,根本是民能自由、自利、自治(严复,1895c/1986:27)。“民”能自由、自治才能独立,“民”的德、智、力也才能发展,这是理解严复“民本论”思想的关键。当然,严复也是主张民权或民主的,所以他才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但认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具体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非抽象的“人民”或“公意”。

因此,李泽厚认为严复的民主政治思想,“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李泽厚,2008:288)。黄克武也认为严复并不赞同卢梭“天赋人权”学说中的非历史观,认为平等、人权、民主都是历史进化的产物(黄克武,2000:13、42)。严复也经常把西方“民权”的学说与中国古代孟子、老子贵民的学说相比附,但他又说“中国未尝有民主制也。虽老子亦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这样一来,严复似乎认为孟子、老庄的思想中有民权思想,但是却没有民主制度之实(黄克武,2000:230)。

四、具有有机论和演化意义的“群学”

严复的“群学”,还具有有机论的意义,指社会有机体内各部分相互分工、相互配合。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所谓群者,固积人而成者也。不精于其分,则末由见于其全。且一群一国之成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治相准”(严复,1895b/1986:6-7)。严复在《天演进化论》说,“斯宾塞以群为有机团体,与人身之为有机团体正同。人身以细胞为么匿,人群以个人为么匿。最初之群,么匿必少”(严复,1913/1986:311)。这就是说,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一样,都有基本单位,也有血脉、器官和神经中枢。一个“社会有机体”内,不同的部分分工严密、相互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协作，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个人团体、道路交通、统治机关和法律政府，对于社会有机体的运转来说，必不可缺。

既然社会有机体同生物有机体一样，有身体、心灵和智力，那么社会有机体的强弱也就有所差别。严复在《原强修订稿》言，“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严复，1895c/1986：17-18）。一群如一生物体，其大小、强弱、神形也都和内部个体的力、德、智的发育程度相关。

不过，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也有差别。严复在《天演进化论》指出，生物有机体只有主部分有知觉，其他部分都围绕主部分转，而社会有机体中各部分都有觉性；社会、国家都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其中每个个体都有“觉性”，国家、社会的“觉性”有赖于人民的“觉性”（严复，1913/1986：314）。

尽管严复认为“民本论”的基础是个体的自由和人格自立，倡导个体在力、智、德方面都能充分发展，但他并不认为个体为了私利，可以无限制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三 制私”一节开篇就说，“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为群者，又莫人若”(严复，1898b/1986：1346)。一群之涣散与内部个体无限制私利竞争密切关联，而一群之合力，也在于个体是否相互通感、相互化合。严复更看重的是“群”意义上的自由和“群”意义上的竞争，而非个体意义上的完全自由和私利竞争。尤其是人类社会，最能集合成群，也最能“善群”，也会限制内部个体无序的私立竞争。

面对有限的食物和资源，社会有机体内不同个体的利益如何协调，这对有机体的存续和强弱来说就至关重要。严复在《天演论》“论十五 演恶”中引斯宾塞立保种三大例曰：“一曰，民未成丁，功食为反比例率；二曰，民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率；三曰，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用三例者群昌，反三例者群灭”(严复，1898b/1986：1393)。严复认为，当民已成丁，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后，人口所需量和食物量就成正比，不会出现争夺的情况；当“群”和“己”的力量并重或冲突时，也需要“舍己成群”。严复相信个人具有崇高的价值，同时也看重“群”的强盛和重要性，但他并不是主张集体主义，而是强调在“群”与“己”之间可以达到一种平衡关系（黄克武，2000：3-4）。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严复看重群与群、国与国、种与种的竞争,因此又写《有如三保》《保教余义》《保种余义》等文章,呼吁国人要保国保种保教。变法图强、保国保种是天演之公理的要求,不变则有灭种之祸。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文中,严复言“天下理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严复,1895a/1986:40)。严复意在将中国的变法纳入世界普世的意义上理解。因此,严复“群学”思想第三个重要层次是在进化意义上的展开,即从人类进化的普遍意义来理解人群的保存和消亡。严复最早在《原强》《原强修订稿》文中定义“群学”概念时,认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严复,1895c/1986:16)。作为一门研究“群理”、理解“人伦治化”的科学,为什么说是“宗天演之术”而开展?何谓“天演”、何谓“治化”?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天演”一词是严复翻译西方“evolution”(日译“进化”)一词而独创的。随着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在18984年出版,进化论中“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语纷纷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天演论》是严复独立翻译中文译本的开始,也是国人独立从事翻译西方学术经典著作的开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为流行的西学译著,对胡适、鲁迅等人的世界观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欧阳哲生,2014:181-182)。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英文原著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严复为什么会选择赫胥黎,而不是斯宾塞或达尔文的书来翻译呢?中译名的“天演”,为何略去英文后半部的“伦理”(Ethics)?“天演”是否完全能等同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呢?这些问题,就涉及严复对斯宾塞、赫胥黎等人进化论的不同态度。要理解“天演”词语的含义以及与“进化”一词的含义差别,重要的是理解“天演”之中“天行”与“人治”之间的关系。

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四 恕败”中言,“群之所以不涣,由人心之有天良。天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巨,此至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自礼刑之用,皆所释憾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消,即治化进而自营减”(严复,1898b/1986:1348)。从严复的表述来看,“天演”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天演”也并非仅是遵守自然界“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天演”之中还包含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就是“治化”。人心有天良,存有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善心，相互通感，所谓“治化”。治化进，而私利的恶意斗争就会逐渐消退，此所谓“治化进而天行消”。培养“治化”最重要的方式即是斯宾塞所言的学校教育；这样一来，严复将赫胥黎肯定人治与伦理原则的观点，与斯宾塞重视以学校教育培养国民的民德、民智、民力的想法结合在一起（黄克武，2014：97）。

斯宾塞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同生物界一样存在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可以运用到人类社会中。赫胥黎不同意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认为社会进化过程不同于生物进化过程，强调伦理在人类社会中的调节作用。李泽厚认为，严复之所以选择赫胥黎这本书，是来补救斯宾塞思想的不足，赞成赫胥黎主张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不同意赫胥黎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同时，严复同意斯宾塞认为自然进化是普遍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的观点，但又不满意斯宾塞那种“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思想（李泽厚，2008：270）。因此，对于《天演论》书名的翻译，李泽厚认为，“书名只用了原名一半，正好表明译述者不同意原作者把自然规律（进化论）与人类关系（伦理学）分割、对立起来的观点”（李泽厚，2008：266）。

王中江进一步指出，严复对进化法则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处理，把问题引向了深处；严复的进化主义既不是完全斯宾塞式的，也不完全是赫胥黎式的，而是经过严复的吸收和消化之后形成的属于“严复的”、复合的“观念形态”（王中江，2010：54）。作为部分或特殊的“人道”或人类社会，一方面隶属于或也适用于整体和普遍的“天道”或宇宙自然过程，但另一方面还存在与“天道”“天行”“自然”同“人治”“人事”“人道”等相对的思想结构（王中江，2010：65）。“天道”与“人道”，它们既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由此，严复并没有陷入斯宾塞进化论的一元逻辑（自然法则完全适用人类），也没有完全陷入赫胥黎二元的对张逻辑（自然法则与人类伦理的对立），而是认为二者是一种适应性、协调性的关系（王中江，2010：66）。

这就是说，严复独创的“天演”一词包含了“天行”与“人治”两个部分。严复的“天演”不是“任天为治”，不是完全按照生物界“弱肉强食”的法则进化；人类社会“治化”的善将逐渐胜过“天行”的恶，社会的进化不是一种“恶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演”,而是一种“善演”。[①]这也就是“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的含义之所在。人类进步,虽不类似于纯粹的自然,而与自然的演进与发育合一,乃为人类的最终伦理目的,此所谓“任天演之自然”之义。如黄克武所指出,“这样一来,严复不是没有翻译书名之中的‘伦理’(ethics),而是将‘演化’与‘伦理’(或天行与人治)结合为‘天演’,以提纲挈领地说明全书之旨趣。”(黄克武,2014:93)

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生物,强者绝对不仅是最“有力者”,还具有“德”“智”。“适者生存”“所存者善”,“适者”最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也应当是有德、有善的人。这就也涉及严复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体合”(adaptation)。严复在《天演论》“导言十五 最旨”文中按语中言:

> “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盖恶劳好逸,民之所同。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严复,1898b/1986:1350-1351)

也就是说,“体合”的规律,适用于万物,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生存下来的,都是“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这是“体合”(adaptation)。严复在《天演论》论第十五“演恶”写的按语中更进一步指出,“然与物竞天择二义之外,最重体合。体合者,物自致于宜也。彼以为生既已天演而进,则群亦当以天演而进无疑,而所谓物竞、天择、体合三者,其在群亦与在生无以异。故曰任天演自然,则郅治自至也”(严复,1898b/1986:1393)。严复认为,以往的进化论只有物竞和天择,其实应该加上最重要的“体合”。有“体合”,则群会不断相生、不断递演,此曰“任天演自然”。

关于严复“体合”的概念,有研究者认为严复的“体合”思想来自斯宾塞的“适应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源于生物学领域的拉马克机制(朱星星,2019)。严复“体合”思想,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斯宾塞的适应理论,但并不能说完全就来自于斯宾塞。如前文所言,严复并没有陷入斯宾塞进化论的一

① 在严复的语境中,“进化”一词也就与“天演”非常不同。“进化”指“进乎化”“进于治” 或“开化”,亦即进步到文明、教化与治理良好之状态,是与“退化”相对而言的概念,与“进步”(英文progress)一词可以等同(黄克武,2014:106)。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元逻辑和赫胥黎二元对立的逻辑，没有陷入“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对立，而是认为二者是一种适应性、协调性的关系，最后达到“任天演自然”的状态。这种适应性和平衡性的观点，其中一部分受《易经》等中国传统典籍的影响。史华兹也指出，赫胥黎和斯宾塞之间基本的哲学争端，即宇宙进程和人类进程的关系，在严复心中引起了共鸣，使得他想起了中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论战（史华兹：2010：73）。用“天演”一词来表达英语“evolution”的含义，说明了严复试图汇通中西方不同的思想。

黄克武也指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有着强烈的中西汇通色彩。“就思想内涵来说，严译《天演论》是以《易经》与《荀子》等传统思想来诠释赫胥黎的想法，借此说明天演过程中伦理的重要性；亦即在宇宙演变之中因为人类颇具有‘善群’‘天良’‘开明自营’等特质，使‘人之所以为人’，以此鼓舞国人‘知变’‘自强保种’。严译《天演论》同时亦再揭橥国人可以接受西学而不贬抑传统，而且中西学可以会通为一。透过《天演论》与其他的作品，严复尝试提出一个融合中外学说的‘天演之学’”（黄克武，2014：85）。严复起初阅读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称之为“群学”，在1896年开始阅读和翻译赫胥黎之书后，将西方这一套思想体系称为“天演之学”，用来统括生物演化论与社会演化论（黄克武，2014：89）。

以“天演之学”为理论体系，严复对现代的个体、社会、国家以及世界的相互关系给出了一整套的阐释。黄克武指出，“根据天演之学的理论体系，严复主张‘群己并重’，在国内政治上应以调适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融合中国传统价值，并肯定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之体制；在国际关系上，严复反对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提出尊重‘公理’‘公法’‘公论’之原则，亦即‘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黄克武，2014：86）。这就是说，严复的“群学”观点具有宇宙观、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意义，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政治发展和国际关系提供了整体性的解释思路和现实的变革方案。

五、余论：严复“群学”思想对民国社会学家的影响

当严复最初用“群学”一词来翻译和表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并与《大学》修齐治平的说法相比附时，就表明严复的“群学”概念内涵丰富，包含对近代社会转型中个体、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相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如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文所言,严复的“群学”思想,其既是一门探究民群聚合离散因果关系的、且作为“学问之要归”的实证科学,还具有修齐治平和变法改革的现实意义;严复的“群学”思想以“民本论”为基础、具有有机论和演化论的重要意义,在自然、知识与人伦之间建立了一种总体性的关联和解释,实为一种“大人之学”。

严复不仅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特别的功劳,而且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了早年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世界观的塑造。如蔡元培很早就把严复视为自己的思想启蒙人物,历经戊戌政变后志在从事教育以开启民智,阐发并运用严复的“群学”思想来理解近代中国转型中的“劳工”和“劳动”问题(马学军,2020)。严复的“群学”思想,某种程度也影响了陶孟和、潘光旦、林耀华等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他们出生于清末民初,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变迁对他们的思想和治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篇幅所限,此处仅简要提及潘光旦、林耀华所受的严复“群学”思想影响。

在吴文藻先生的指导下,林耀华于1932年完成了十万多字的题为《严复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吴文藻在晚年自传中,指出林耀华关于严复社会思想的论文,在其开设的“近现代社会政治思想”课程中非常突出(吴文藻,1982)。吴文藻认为,“研究严复的生平与学说,对于实现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有机结合很关紧要”(林耀华,1999:9)。

该论文修改后以《严复社会思想研究》为题发表在《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文章分析了严复的生平事略和学说渊源,讨论了严复思想中的进化原理、中西方比较以及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变法图强的观点;文中也阐释了严复的“民本论”和演化论的思想。研究严复社会思想,对林耀华后来的治学也产生了影响。如他所言,“我的治学之道就是这样在吴文藻等燕大老师的帮助下,从社会学入门,从严复入手,逐渐展开的。回顾起来,从这个门径进入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还是有它的好处:它使我有机会把中外学术思想史作了一个粗略的比较。这个比较搭起了一个框架”(林耀华,1999:29)。

潘光旦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大家,也是民国时期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参与了民国时期的中西方文化论战,思想观点独树一帜(吕文浩,2009)。潘光旦先生的思想以生物学、优生学为基础,提出的“新人文史观”以科学和实证为方法原则(杭苏红,2018),其重要的“位育”思想涵盖天人之际和人伦之际的整体关系(周飞舟,2019),这与严复以生物学的进化论为基础,以实证科学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为方法原则，来理解个体、社会有机体以及天演关系的“群学”思想是何其相似。潘光旦先生在文章中，还多次直接与严复的天演论观点对话。

在《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1939)文中，潘光旦指出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后，中国文字里多了一套新名字，但是人们对演化论思想的重要影响却认识不足。“四十年来，《天演论》对中国思想的贡献，似乎不过尔尔……演化思想对实际的社会思想和社会问题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很不幸的现象。目前有许多的思想以至于生活上的问题是由于不了解或误解演化论而发生的”(潘光旦，1939：32-33)。对于“天演”这个译名，潘光旦认为“严先生译的《天演论》这一名词原是很好的，天字固然把演化的范围限于自然一方面，有不合用的地方；但演字是不错的。到了后来，不知如何我们偏要拾取日本人的牙慧，通用起‘进化论’的名词来。就从这译名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并没有懂演化的现象”(潘光旦，1939：33-34)。以此来看，潘光旦非常赞同严复用“演化”一词来翻译英语“evolution”，而不赞同后人常用的、由日译而来的“进化”概念。当然，至于“天”的翻译和理解，潘光旦与严复是有着不同理解的。

此外，潘光旦提出的“位育”概念，与严复的“体合”概念，所对应的英文都是“adaptation”，可谓是同源异流。对于“位育”的概念，潘光旦在《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一文中说，“位育是演化论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中国旧有思想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如今演化论的思想，一面固然可以和位育的思想联系起来，一面更可以补正以前的错误与不足”(潘光旦，1939：36)。这就是说，“位育”是演化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中西汇通的概念。在《说“文以载道”》文中，潘光旦在注释中说，“《中庸》‘天地位，万物育’的一段议论和西洋生物演化论中adaptation或adjustment的概念最为接近。位，注称‘安其所’；育，注称‘遂其生’；前者是静态的位置，后者是动态的发育，岂不是恰好相当于‘adaptation’的概念。因此，十余年来，作者就用位育一词作为adaptation的译名，以替代‘顺应’‘适应’一类过于消极与被动的译名，并曾草一短文加以介绍”(潘光旦，1943：256)。以此可见，潘光旦的“位育”概念实为理解和翻译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的“adaptation”而来，又采用《中庸》“天地位，万物育”的说法，兼具静态安位和动态变化的意涵。这与严复“天演之学”中的“体合”概念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至于优生学说是否适用人类社会，严复和潘光旦有着不同观点。这一点需另文来详细讨论。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以此可见,严复的“群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严复的“群学”思想,以实证科学为方法原则,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色彩;严复“群学”思想,以“民本论”为基础,注重民力、民智、民德的根基和培养,从一开始就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关注普通民众、注重实地调查、理解民情民俗的特点;严复“群学”思想,探究人与社会的有机关联、与自然万物的演化关系,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社会学对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的理解。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世界格局变动的局势中,重返严复具有总体意义的“群学”思想,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中国社会学的诞生,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蔡乐苏,1999,《严复启蒙思想与斯宾塞》,刘桂生等编《严复思想新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韩立坤,2014,《从“技”到“道”——严复“科学观”的演变,兼论近现代哲学中科学的形而上学化倾向》,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八辑“严复专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杭苏红,2018,《人的科学:潘光旦的科学观》,《学海》第5期。

黄克武,2000,《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八辑“严复专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泽厚,2008,《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林耀华,1933,《严复社会思想》,《社会学界》第7卷。

——,1999,《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吕文浩,2009,《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马学军,2020,《自食其力与合群互助: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释义》,《社会学研究》第3期。

欧阳哲生,2014,《严复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潘光旦,1924/2000,《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39/2000,《演化论与几个当代的问题》,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渠敬东,2015,《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第1期。

沈国威,2018,《严复的“格致”:从培根到斯宾塞——以〈天演论〉前后为中心》,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华兹,2010,《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陶孟和,1913,《平等篇》,《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

汪晖,2019,《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2014,《严复全集 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王中江,2010,《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增补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吴文藻,1982,《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第6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严复,1895a /1986,《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895b /1986,《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895c /1986,《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895d/1986,《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898a /1986,《西学门径之功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898b /1986,《天演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
——,1913/1986,《天演进化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阎明,2004,《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杨雅彬,1987,《中国社会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应星,2018,《略述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的初兴》,《学海》第3期。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第4期。
周飞舟,2019,《人伦与位育: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儒学基础》,《社会学评论》第4期。
朱星星,2019,《严复译〈天演论〉"体合"思想溯源》,《人文杂志》第11期。

People-Oriented, Organic and Evolutionary: Inquiry into the Thought of Yan Fu's Sociology (Qun Xue)

MA Xue-jun

Abstract: Yan Fu's concept of Qun Xue emerged while Yan's translating of Herbert Spencer's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 Qun Xue was supposed to be both a positivist scientific discipline that investigates the principles of society, and a tool for national reform and revival. Based on Yan Fu's writings, this paper explains Yan Fu's idea of Qun Xue from four aspects: Qun Xue as "the key to learning", Qun Xue based on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and Qun Xue with organic and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Yan Fu's idea of Qun Xue established an overarching explanatory framework between academic knowledge, the natural order, and social life. Yan's though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influenced the thinking of Republican sociologis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Yan Fu's idea of "Qun Xue"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sociology.

Keywords: Yan Fu; Qun Xue; people-oriented theory; organic theory; evolutionary theory

(责任编辑:闻翔)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